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

——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

左玉河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 / 左玉河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ISBN 7-80678-327-X

I. 从... II. 左... III. 科学体系学—研究—中国—近代 IV. G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0892 号

责任编辑 郑力民

封面设计 程 钢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

——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

左玉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 × 965mm 1/16 印张 30.75 字数 404,000

2004 年 10 月第一版 200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678-327-X/K · 62

定价：56.00 元

序

耿云志

左玉河著《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即将出版,索序于余。时间紧迫,不及通阅全书。他撰著此书已有三年多,曾陆续谈及其撰著大意,余亦赞成其大旨。

近年来,关注近代学术史的人渐渐增多,已有一些著作出版。从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关注文化史,到今天关注学术史,有其逻辑的必然性。梁任公曾说,学术乃文化之核心。当年人们关注文化问题,是多年激烈的政治动荡之后的反省有以促成之;而今日之关注学术史,则又是多年的文化热之后的反思有以促成之。但无论是文化史,还是学术史,都是极大极难的题目;必须有充分的积累做基础,才比较易于着手。我说的积累,主要的还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整个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近一百多年来,一直是在一种紧迫的环境中,紧紧地赶着。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做跨越式发展。在科学、学术上是否有跨越式发展,很值得研究。我们大家有时确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旧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逼人而来,想躲避都来不及。现在研究文化转型问题,研究学术转型问题,我都有这种感觉。希望我和我的朋友们能尽最大心力,把自己选定的课题,做得扎实些,深入些,以为后来者做一些铺垫,增加一些积累。

任公先生把学术看成是文化的核心,是有道理的。人类文化之传承,一方面靠口说、示范,即言语、行为;一方面是靠文字、器物。而自有文字始,人的思想、言语、行为及其所用器物,皆可笔之于书。因而,文字之传承功能要比口说与行为等范围更广,效用更大。言

语、行为只能直接传授，而文字则可间接传授。直接传授者，只可及于少数人；而间接传授者，可及于千百人，千万人。直接传授者，只可及于两三代人；而间接传授者，则可绳绳墨墨，由古及今。学术是以文字传承文化之最重要者，其所含知识、信息、思想、理论、方法等等，乃经历代学者精思、磨洗、锻炼而成，是文化之精华。按，“学”，《说文》谓与“教”通。“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广雅·释诂》则直谓：“学，效也。”“效”即是仿效，即是传承。“术”，《说文》谓“邑中道也”，指道路，引申之，则门径、方法等义皆在焉。前人将“学”与“术”合为一词，我想可否理解为，学术是从累代所积之经验、知识中，求出通向未来的途径。如此，则学术必关乎社会、国家、民族之前途与命运。所以，历代学者一向以学术、道义一身肩之。当然，像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纯属吹牛皮，说大话，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但作为学者，以淑世的责任心与使命感以自励，当是应有之义。

治学术史，特别是研究从古代学术到近代学术转型的轨迹，自当着重在彰显学术模型的变化。左玉河此书亦正为此。书中较详细地梳理出晚清时期中国学术从古代不甚严密、不甚合理的四部分类，到吸收西方学术的分科方法而演成七科的分类，从而初步建立较为近代的学术体系的过程。其中提出了不少有创意的见解，值得同行们注意。

前面说到，文化史与学术史，都是极大极难的课题，需要众多学者代代相继，深入研究，不断积累。此事不可因其难而却步不前。俗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总是免不了有一段筚路蓝缕的过程。同时，尤不可急于求成，或浅尝辄止。宜潜心寝馈，一意求之。愿以此意与作者及读者共勉之。

序

刘桂生

中西文化的接触,从宋、元以来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中,但是,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并作为一种制度在中国全面扎根,却是迟至清末民初才逐渐实现的。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各地陆续设立的洋务学堂,戊戌变法高潮中设立的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堂,特别是20世纪初由张之洞等人主持完成的学制改革,以欧美发达国家大学课程设置为蓝本,正式把中国原有的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四部之学”,转向包括理、工、农、医、文、法、商在内的“七科之学”,“四部”原先所涵盖的知识,由此基本退缩入“文”科之下,成为一个分支学科,而新兴的近代科学诸学科则得以进入小学术文化体系,总体方向亦由原来的选拔“公务员”,向培养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过渡。

这是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涉及到的问题颇多,举凡政治、经济、学术、文化、教育诸方面,均牵涉其中。这样一个大问题,我还没有看到过系统的研究成果,一切得从头做起,难度颇大,很不容易理出头绪,组织材料就更难。课题本身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较高的中西文化两方面的专业知识。中国方面,古代文化史、学术史,特别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知识必不可少,同时还需要有西方近代文化史、教育史,特别是“科学建制化”与“教育建制化”两方面的知识。

困难虽多,但这却是一个很有意义,特别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这个课题等于着手整理20世纪

中国文化的“老家底”。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 20 世纪的中国教育、文化制度虽历经数次变化,但其基本架构却是在晚清改革后所实行的新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另一方面,新文化中的各种因素、成分相继转化并凝聚成人们头脑中的各种“先见”。正是这些“先见”支配着我们的头脑,从根本上决定着我们对各种外来文化的态度,何者应从,何者应拒;何者应取,何者应弃。这种不同态度,最终必将影响到民族振兴的大业,意义之重大,不难想见。

通过这段历史,我们看到:近百年种种中西文化交汇的成果,几乎无一不是在“中西文化之争”的乐曲声中形成的。任何时候都有“争”,任何时候都有“合”。但“争”自由它争,“合”自由它合,两不相下,各不相让。往深处看,则“争派”往往从文化内部看文化,着重文化的“性质”、“成分”一类问题,以便作出“优劣”、“异同”之类判断。反之,“合派”则往往从文化外部看文化,着重文化的“功能”、“作用”一类问题,以便搞清楚文化能不能与政治、经济、军事等部门协调发展这一类“大事”。从内部去看,容易发觉“争”与“不争”这一方面的问题;从外部去看,则容易发觉“合”还是“不合”这一方面的问题。历史现象就是如此。我并不认为“争”好,“合”就一定不好;或“合”好,“争”就一定不好。只是主张:在“争”中求“合”,在“合”中求“争”;“争”中形成共识就“合”,“合”中发现差异就“争”,既重视“内部”,也重视“外部”;有“争”有“合”,才能“创新”,有“争”有“合”才能“继承”,否则两方面都要落空,必须让他们相辅相成、相依为命地发展下去。

我与左玉河认识近十年。起因是 1996 年春,北师大历史系王桧林教授请我参加他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会。这个博士生是左玉河,论文题目是《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张东荪先生似乎早已被人遗忘,今天是可以或应该对他——特别是他的思想进行研究的时候了。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但是,事不凑巧。当王教授请我去参加答辩会的时候,我已经安排好到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的日程,就要动身,一切都来不及了。答辩会虽然没有参加成,但我却因此认识了左玉河。时间很快过去三年,大约是 1998 年秋的一天,左玉河把他的新

著《张东荪传》给我送来。我一翻就觉得在史料上确实下了功夫。他告我,师大毕业后转到近代史所做博士后研究,现已留所工作。时间很快又过去五年。半月前他打电话告诉我,他的又一部新著《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中国近代知识系统之创建》又要出版了,请我写篇序。我有点为难,因为我没有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他的盛情难却,只好答应,写了上面这些话,算作序吧。

2004年9月于清华园

序

王桧林

左玉河十多年来以研究张东荪生平及思想为主。在撰写出版三部有关张东荪思想的专著后,他开始将研究重心拓展到近代学术史上。这部关于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创建问题的专题性书稿,便是他博士后出站五年来,潜心研究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的阶段性成果。

该书稿的最大特点,是作者具有强烈的学术创新意识,大胆地涉足于中国学术流变及近代学术转型这样高难度选题,并在前人基础上,从学术分科角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命题:如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分科体系;中国学术具有重“博通”的特性;近代中国知识系统的创建过程与中国传统学术分化改造过程同步等等。尤其是对“四部之学”与“七科之学”两个概念的提出与界定,更显示了作者的学术创新勇气和对中国传统学术思考的深入。

作者将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简称为“四部之学”,将近代中国建构起来的新知识系统,简称为“七科之学”,并用“七科之学”与传统“四部之学”相对应,不仅意在表明中西两套知识系统的差异与区别,而且在于说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在近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是前人没有的见解。

该书稿的另一特点是具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浓厚的实证色彩。作者既不过多地空发议论,也不刻意用某种“范式”理论来建构所谓“历史图像”,而是用力发掘相关资料,在掌握大量资料基础上,分析中国传统学术分科的特点,弄清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的构

成及内部逻辑结构,说明在晚清时期西方近代意义的学术分科观念、分科原则及学术门类是如何一步步传入中国的,阐述中国传统知识系统是怎样一步步向近代意义的知识系统演进的。作者在这种严谨朴实的精神指导下进行研究,使书稿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因而该书稿也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传统学术转入近代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是很复杂的过程。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以接纳西方学科体制,仅仅是中学转入近代学术体系的开始;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编目中外典籍,也是中学转入西方近代知识系统之初步。中国传统知识系统要完全转入近代西方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中,必须采用近代分科原则及知识分类系统,按照近代科学方法对中国学术体系进行重新整合,对中国“四部”名目下的古代典籍进行重新类分,对中国旧学作出新的阐释和发扬。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工程,这项工程主要是在五四以后的所谓“整理国故”过程中完成的。因此,作者在写完这部书稿后将研究重心逐步放在民国时期,是恰当的。

中国近代学术转型,是指传统学术形态向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变,这种学术分科及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仅仅是这种学术形态转变的一个方面。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型,实际上就是从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向现代分科性质的“专门之学”转变。这不仅需要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入手,考察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过程,分析其转变的原因、契机、标志、过程及最初形态,重点考察学术研究方法、立场、观点、内容等范式转变,而且还要从学术发展的外部环境入手,考察清末民初社会结构、阶层变动、思潮涌动等因素对学术转变的影响,分析西学的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晚清学术转变的推动,注意考察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构成、交流模式、新旧学术体制、学术交流机制的建立及对学术思想转变的影响,重点考察研究中国现代学术的制度化、体制化、分科化、职业化等问题。简言之,应着力于研究两种学术形态在学术研究的主体、学术研究机构及学术中心、学术研究理念及宗旨、学术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范围、研究成果及交流机制、学术争鸣与成果

评估等问题上的变化与差异。如此看来,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之重要性与复杂性,可能超出了课题研究者原来的设想,当然也绝非这部书稿所能完全解决的。

好在左玉河完成这部书稿后,又承担了耿云志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卷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我衷心地希望他继续在该问题上深入研究,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地描述出来,为学术界贡献出他的意见。

这部书稿的学术价值如何,当由学术界来评定。我想借此机会,谈谈思想史研究中的实证化倾向问题。汉学与宋学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公案。是注重发挥思想家文本中的义理,还是着重于考证文本?这是研究者见仁见智的问题。从事思想史研究,必须进行系统的理论思维的训练,必须具有较强的抽象思辨性。这是治思想史者的基本功。只有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才能发掘文本之内在义理,才能使思想史研究具有必要的理论深度。左玉河从我研习近代思想史过程中,在思想史、哲学史的理论思维上受到了一定的训练,具备了较强的哲学思辨能力。这种思辨能力在张东荪思想研究中得到了体现。

近些年来,或许是由于在近代史所工作的缘故,左玉河深受近代史所实证学风的影响,更加关注于史实的考辨、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运用。这种特点,在这部书稿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验证。这是其学术进步的表现,希望他继续本此方向努力。但我想在此说一说另外一方面,即思想史研究毕竟要以发掘文本之义理为主,实证性研究并不是思想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对于文本资料本身,必须对其内涵作深入的分析和认真的阐释,其蕴含的义理才能显现出来并显现其价值。故尽管实证性研究是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和保障,但决不能因此忽视理论思维的训练和抽象思辨能力的提高,由此进入更高的思想境界和学术境界。这或许是左玉河今后从事思想史研究时应当注意的。

新时代要求与自己相称的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希望左玉河永

远不要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而应再接再厉,撰写出更高水准的学术著作。我衷心地期待着。

2004年9月20日于北师大

导 论

中国传统学术及其知识系统,主要集中于经、史、子、集“四部”框架之中。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学术基本上是文史哲不分的。然而,现代分科性之学术体系、知识系统及学术门类,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人们对此作出了不同的估计。

陈平原认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在“清末民初 30 年间”,他主要以章太炎作为晚清一代学术的代表,胡适作为五四一代学术的代表,通过对这两个典型人物的分析,说明现代中国学术在五四时期确立^[1];刘梦溪在为其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所作之长篇序言中,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发端于晚清,确立于五四时期^[2];朱汉国也持相似观点,认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的”^[3]。这些学者尽管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发端问题上略有分歧,但一致认为现代学术的确立(即学术转型的完成)是在五四以后。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学术之最终确立是在五四之后,特别是五四后的整理国故过程中,但它的发轫和初步确立,则是在晚清时期。

中国现代学术是如何在晚清时期发端的?中国传统学术是如何一步步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目前,学

[1]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2]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第 49~50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3] 朱汉国:《创建新“范式”:五四时期学术转型的特征及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

术界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已经给予一定重视,并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1〕},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清晰地勾画出晚清到民国学术转型的历史轨迹,更没有对晚清时期传统学术的嬗变和现代新学术的发轫给予必要的实证性研究。至于学术转型之外在标志——学术分科和中国近代学术门类在晚清时期之初创,也没有给予更多关注;对于以“四部”为骨架建立之中国知识系统在晚清时期的转型,同样没有给予应有重视。正因如此,笔者试图从学术转型之外在表现——学术分科问题入手,从一个侧面揭示晚清学术转型之历史轨迹及中国学术融入近代知识系统之趋势。

在社会变局和西学东渐之时代潮流影响下,中国传统学术在晚清时期开始向近代学术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发生了分化,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初步建立起近代意义上之学术门类,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开始纳入近代知识系统之中。从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向西方近代“专门之学”转变,从“四部之学”(经、史、子、集)向“七科之学”(文、理、法、商、医、农、工)转变,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变的重要标志。这种现象,自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中国学术是如何从“四部”分类向“七科”分目演变的?中国近代分科性之学术门类是怎样建立的?中国传统知识系统是如何融入西方近代知识系统中的?正因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就这些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故笔者力图在本著中予以初步探讨。

笔者的问题意识是:中国传统学术有无分科观念和自己的分科体系?传统意义上之“四部”分类是如何向近代性质上的“七科”分

〔1〕陈平原之《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刘大椿之《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的大撞击》(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罗志田之《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先明之《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郭双林之《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桑兵之《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方朝晖之《“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目演变的?中国近代分科性质的学术门类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建立起来的?在学术分科背后之中国知识体系,是如何被接纳到以西方知识系统为主要参照系之近代知识系统中的?笔者通过对中国学术分科及晚清学术演变历程之综合考察,试图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笔者研究的重点,是晚清时期学术分科及由此导致的中国近代学术门类初创、近代中国知识系统的创建等问题,力图在实证性研究基础上,通过形式化分析及动态性考察,揭示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形态转变过程中一些带有普遍性之问题。

所谓实证性研究,就是努力发掘相关文献资料,在掌握大量资料基础上,分析中国传统学术分科的特点,弄清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之构成及内部逻辑结构,说明在晚清时期西方近代意义之学术分科观念、分科原则及学术门类是如何一步步传入中国的,阐述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是怎样一步步向近代意义之知识系统演进的,既不过多地空发议论,也不刻意用某种理论范式来建构所谓的历史图像。

所谓形式化分析,就是鉴于以往学术史研究多关注于学术思想自身之演变,注重分析学者之学术思想来说明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笔者则将着眼点放在引起学术转型之众多外在因素上,通过对诸如经世之学兴起、西书翻译、新式学堂创建及其课程设置、典籍分类及图书目录等作详细分析,说明晚清时期学术分科与中国近代知识系统创建之情景。

所谓动态性考察,就是始终把握近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之“演变”上,详细考察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演变之历史轨迹,新观念之演变及学术分科及知识分类在晚清是如何演变的,反映出这段历史特有之动态历史感。实证性研究、形式化分析及动态性考察,所要达到之目标是:力图从学术分科问题入手,客观地勾勒出中国传统学术及知识系统向近代学术及知识系统演进之历史轨迹。

笔者认为,如果按照近代西方学术分科观念来反观中国传统学术分科,便很容易发现:中国的确没有近代意义上、以学科为类分标

准之学术分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学术分科观念及分科体系。实际上,中国古代有着一套独特的学术分科体系,其学术分科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其中最突出之现象,就是中国学术分科,主要是以研究主体(人)和地域为标准,而不是以研究客体(对象)为主要标准;它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古代典籍涵盖之范围内,并非直接以自然界为对象;中国学术分科主要集中在经学、小学等人文学科中,非如近代西方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中。换言之,中国不仅存在着一套不同于西方近代式之分科体系,而且存在着一套完整的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为骨架建构起来之知识系统。中国学术尽管也有专门性学问,但并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学科意义上的“专门之学”,中国学术具有“博通”之特性。

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可以简称为“四部之学”。所谓“四部”,即《四库全书总目》类分典籍之经、史、子、集四部;所谓“学”,非指作为学术门类之“学科”,而是指含义更广之“学问”或“知识”;所谓“四部之学”,非指经、史、子、集四门专门学科,更不是指经学、史学、诸子学和文学等,而是指经、史、子、集四部范围内之学问,是指由经、史、子、集四部为框架建构的一套包括众多知识门类、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之知识系统。这套“四部”知识系统,发端于秦汉,形成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并以《四库全书总目》之分类形式,得到最后确定。晚清时期,“四部”知识系统在西学东渐大潮冲击下,不断解体与分化,逐渐为西方近代以“学科”为类分标准建构起来之新知识系统所替代。

近代中国新知识系统之出现及形成过程,便是中国传统学术及知识体系在晚清时期发生分化与嬗变之过程。这一过程,与经世思潮之兴起、学术风气之转变及西学东渐密切相关。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经历了“四部”分类——经世“六部”——“七科”分目——“八科”分类之演变过程,最终在1912年定型为“七科之学”。正是在近代中国学术分科及知识系统发生重大转变过程中,近代意义上之自然科学各学术门类(所谓“格致诸学”,即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所谓

“法政诸学”,即文艺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逻辑学等)才相继创立。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是经过两条渠道创立起来的:一是移植之学,即直接将西方近代学术门类移植到中国来,这主要是那些中国传统学术中缺乏之学术门类,如自然科学中之近代数、理、化、生、地等门类,及社会科学中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法学等;二是转化之学,即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演化而来的,这主要是那些中国学术传统中固有之学术门类,如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字学等。在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向现代学术门类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学术必须从两方面进行学科整合:一是文史哲分家;二是引进西方近代学科。这种转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20世纪初基本实现,而直到20年代末才最后完成。

随着西方分科性学术及其学科门类之输入,中西学术之配置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如何被纳入到以“学科”为分类标准的近代西方知识系统中。晚清时期,以经、史、子、集为框架的“四部”知识系统,受到近代西方以“学科”为类分标准之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的挑战。伴随着西方学术分科观念、分科原则及西方学科体系之引入,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必然逐步解体,被消融在近代西方知识系统之中。因此,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在晚清面临着重大转轨:从以“四部之学”为框架的知识系统,转向近代西方以学科为框架之新知识系统,简单地说就是从“四部之学”转向“七科之学”。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之过程,既是中国传统知识系统逐步解体的过程,又是中国近代知识系统建立的过程。在中西学术配置问题上,当西学刚刚输入中国时,是西方学术如何纳入中国学术体系中的问题,于是“西学中源”说应运而生;随着西学输入的强化,中西学术被纳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知识框架中;20世纪初期,随着西学输入之势的不可逆转,所要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在中学体系中如何接纳西学,而是在西学成为学术主流后,中国学术如何纳入近代西方学术及知识系统中之问题,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实际上可称为“西体中用”之知识配置模式。

近代中国建构起来之新知识系统,可简称为“七科之学”。所谓“七科”,是指作为大学分科设置的文、理、法、医、农、工、商七科;所谓“学”,非指狭义之“学科”,而是指广义之“知识”;所谓“七科之学”,是指按照学科标准以文、理、法、医、农、工、商七科为骨干建构起来之知识系统。这套知识系统中之各“科”,又包含了众多相关学科门类。西方近代知识并不一定非以“七科”分类,而有许多类型的知识分类体系,但就近代中国而言,因为学术门类及知识系统之引入,与新式学堂的创建、西方新学制之移植息息相关,故清末大学分科方案中的“七科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晚清时期中国重新建构之新知识系统的代名词。而“七科之学”也大体涵盖了当时传入中国之西方学科门类及知识门类,基本上将中国固有学术与新引入之西方近代学科门类包含在内。因此,笔者用近代“七科之学”与传统“四部之学”相对应,不仅意在表明中西两套知识系统之差异与区别,而且在于说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在近代发生之剧烈变化。这种剧烈变化,集中体现于从传统“四部之学”演进为近代“七科之学”。

中国典籍“四部”分类法转向西方近代图书分类法,是中国知识系统在晚清时期重建之体现。这种典籍分类之演化,不仅仅是改变典籍分类法之简单问题,而是从以“四部”为框架的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向以“学科”为主的新知识系统转变之重大问题。表面上是将“四部”分类体系下之典籍,归并到西方十进法图书分类体系中,实质上却是将“四部之学”知识系统逐渐消解掉,融入到近代“七科之学”知识系统之中。正因如此,考察中国传统“四部”分类法向西方近代图书分类法之转变,是揭示“四部之学”知识系统向近代新知识系统演化的重要线索。用杜威十进分类法替代四部分类法之过程,既是将四部分类体系下之典籍拆散,归并到十进分类法体系下各种学科门类中之过程,也是将“四部”知识系统整合到西方近代知识系统中的过程。晚清时期典籍分类转化演进之过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知识系统逐渐从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演进之复杂历程。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纳入近代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是